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

2023年3月下旬刊
总第59期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AINT-PIERRE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编者语

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关联，传统的安全概念已经扩大到包括一系列广泛的非军事威胁，如气候变化、大流行、网络攻击和经济不稳定，这要求我们发展新思维和新方法来应对这些挑战。在本期刊物中，我们将为读者带来深入探讨非传统安全各个层面的文章，包括国际新闻中热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下属农业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员们再次强调要加强解决严重粮食安全危机的努力，这对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说，全球继续面临由冲突、气候变化和经济冲击造成的“现代史上最大的饥饿和营养危机”。

联合国利用其近半个世纪以来

第一次关于水安全的会议，推动各国政府更好地管理世界范围内的水资源。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会议上说，“我们正在通过吸血鬼式的过度消费和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耗尽人类的命脉，全球变暖更是加快了水的蒸发。”

DigitalOcean 的研究发现，中小型企业（SMB）和初创企业的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网络安全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和普遍。对于企业来说，安全漏洞的风险不仅在于客户数据的泄露和信任度的下降，而且如果系统因分布式拒绝服务等攻击而脱机，还会造成收入损失。

东盟和中国在东盟秘书处举行的第 24 次东盟 - 中国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上重申了推进其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并在《2021-2025 年东盟 - 中国

行动计划》及其附件包含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政治对话与合作、非传统安全、贸易与投资、粮食与农业、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安全、数字经济、旅游、教育、公共卫生、文化与信息、媒体、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十分感谢本期刊物的投稿学者，他们分享了他们在这些重要领域的洞察和专业见解。我们希望本期刊物能够引起人们的思考，并激发人们对当今世界关键问题的讨论。

一如既往，我们欢迎读者的反馈，并期待听到您对本期刊物的看法。

2023 年 4 月 1 日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刊物编辑部

目录

01	智库追踪 THINK-TANK TRACKING	11
02	前沿研究 FRONTIER RESEARCH	16
	食物是武器？粮食地缘政治和卡塔尔 - 海湾裂痕	16
	在环境框架之外考虑平流层气溶胶注入：可理解的“紧急”技术修复和先发制人的安全	17
03	学者访谈 SCHOLARS INTERVIEW	18
	Ricardo Francisco Reier Forradellas：面对新冠流行经济危机的央行货币政策	18
	Amy Erica Smith：身份认同对巴西选举的影响	20
04	研究员专栏 RESEARCH COLUMN	22
	谢贵平 章雅荻：和合共治：外部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的中国智慧与探索	22

学术委员会



余潇枫

主席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魏志江

委员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主编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冯长根

委员

科技安全专家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利兹大学物理化学系博士



余翔

委员

知识产权专家

欧洲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湖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管理学博士



徐晓林

委员

非传统安全治理专家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原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

组专家



黄建钢

委员

海洋安全专家

浙江省社科二级教授

浙海大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

(CZZC) 首席专家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陈斌

委员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长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主任

广东印太和平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顾问团队



Ritu Agarwal
经济安全专家
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德里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



Keven E. Bermudez
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专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顾问、“好邻居”组织创始人
医学博士



高剑波
信息安全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教授、博导
UCLA 电子信息工程博士



胡靖
粮食安全专家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Mohd. Aminul Karim
区域安全合作专家
孟加拉国独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国际政治科学协会会员
印度达卡大学博士



刘国柱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Yannis A. Phillis
产业安全专家
克里特科技大学校长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动态系统控制博士



谌新民
人口安全专家
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决策顾问专家
暨南大学经济学博士



成锡忠
海外利益保护专家
西南政法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所特聘教授
北京中安华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常务顾问
西南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东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Chris Hadley
社会安全专家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何一平
经济安全专家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原执行会长
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原副主任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李晓峰
经济安全专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
博士与博士后导师
复旦大学博士后



林坚
文化安全专家
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Filippus Proedrou
能源安全专家
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员
色雷斯民主大学能源学博士



Jeffrey Reeves
文化安全专家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副总裁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Syed Hussain Shaheed Soherwordi
恐怖主义问题专家
白沙瓦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教授
爱丁堡大学博士



Kate Tulenko
公共卫生安全专家
Corvus 医学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



Johannes Urpelainen
能源安全专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SAIS 教授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



Vlado Vivoda
能源安全专家
昆士兰大学可持续矿产研究院研究员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余乃忠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特约编辑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于铁军
国际安全理论专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主任，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



姚羽
网络安全专家
东北大学教授，博导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会评专家
国家 863 高科技计划会评专家
东北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



张金生
贸易安全专家
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原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赵英
产业安全专家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周树伟
社会安全专家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高端智库专家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广东省商务厅原副巡视员



朱新光
社会安全专家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研究员团队



艾尚乐
金融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程永林
金融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外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后



樊守政
恐怖主义问题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候选人



侯颖
社会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博士后
澳门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晋继勇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副院长、博导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Ilan Kelman
风险与减灾研究员
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伦敦大学风险与减灾研究所教授



李佳
文化安全研究员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副教授
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



陈永品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员
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博士



陈玉梅
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
电子高级工程师
暨南大学政务大数据开放与社会创新创业
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澳门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



侯建雄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
广东世能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



黄永弟
“一带一路”非传统安全风险研究员
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广东金融学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治理研
究所所长



Irfan Ullah Khan
人口安全研究员
浙江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候选人



李方芳
全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球健康外交顾问
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巴塞罗那国际健康研
究所双博士



李乾
海洋安全助理研究员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廖丹子
非传统安全理论高级研究员
浙江省数字安防与非传统安全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刘凤元
金融安全高级研究员
华东政法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



刘金山
经济安全高级研究员
暨南大学投资咨询（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刘天阳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员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哲学博士



刘元玲
气候安全高级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卢矜灵
东南亚地区安全研究员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越南语信息员



麦方
财政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



Bakirov Maksatbek
中亚地区安全研究员
吉尔吉斯奥什国立大学硕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莫有恒
海洋安全助理研究员
武汉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候选人



覃胜勇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中山大学医学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Imran Ali Sandano
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员
巴基斯坦信德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Luis L. Schenoni
拉美安全研究特邀研究员
伦敦大学学院安全研究助理教授
圣母大学政治学博士



汤取安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中城卫保安集团原国际部副总经理
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安全专家（CISSP）
中国国家注册高级保卫师



Diana Toimbek
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员
哈萨克斯坦国际研究实验室高级专家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王冕兴

社会安全研究员
广东省惠州市府办政策研究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王新和

北极问题高级研究员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王卓

社会安全高级研究员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主任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博士



谢法浩

社会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谢贵平

边疆安全治理高级研究员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许涛

中亚地区安全高级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亚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博导
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



张建华

贸易安全助理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博士生



章雅荻

移民治理方向研究员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赵欣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广东信良兆诚律师事务所主任
广东法学律师研究会副会长



郑先武

区域合作安全高级研究员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周龙

人口安全研究员
广外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主任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周木亮

经济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州商务局国际招商处处长



钟晓君

经济安全研究员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财经学院商务系主任，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周燕萍

贸易安全助理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博士生



周章贵

资源安全高级研究员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水资源安全研究所所长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邹冠炀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英国爱丁堡玛格丽特女王大学博士

1 智库追踪

贸易法有助于解决全球市场波动

■ 经济安全：贸易安全

Jeffrey Kucik, 威尔逊中心国际贸易及投资研究员。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经验表明，世界各地贸易关系已经完全被扰乱，这引起了商品供应不足、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危机。因此，世界各国需要密切关注市场波动，把市场稳定作为核心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其中，国际贸易法对维持市场稳定起到关键作用。国际贸易条约减少了成员国引入新的不稳定因素的可能性，从而减少各国贸易壁垒，遏制保护主义，深化各国经贸合作。但是贸易法也不

是一个完美的解决途径，其中存在的豁免条款会导致部分国家逃避责任。虽然市场波动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国家贸易法还是可以限制相关保护主义政策，帮助稳定全球市场。

来源：
Global Market Volatility Hurts Everyone. Trade Law Can Help. | Wilson Center |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global-market-volatility-hurts-everyone-trade-law-can-help>

中东的新型毒品：芬乃他林

■ 社会安全：大规模毒品问题

Nicole Robinson, 美国传统基金会中东及北非研究员。

近日叙利亚边境发生枪战，涉及中东的一种新兴毒品——芬乃他林的非法走私问题。芬乃他林已经成为中东需求量最大的毒品，当地警察每周可截获几百万片药丸。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正试图大力打击毒品交易，但芬乃他林的市场需求保持增长以及地下组织对毒贩以及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这导致了毒品打击行动的困难大大增加。由于约旦和沙特加强其边境管制，流向叙利亚和伊拉克的

芬乃他林毒品数量急剧增长。同时，两国毒贩与政府勾结，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毒品泛滥问题更加严峻。打击毒品的行动在中东处于起步阶段，而伊拉克做好了成为下一个毒品大国的准备。

来源：
Captagon, the New Cocaine of the Middle East? |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 <https://www.heritage.org/middle-east/commentary/captagon-the-new-cocaine-the-middle-east>

将美国公共卫生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围

■ 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

Mahshid Abir, 威尔逊中心医疗政策高级研究员;
Daniel M. Gerstein, 威尔逊中心高级政策研究员。

新冠疫情的经验表明，美国需要在更广泛的国家安全背景下建立更坚实的卫生安全系统。除了卫生保健和公共卫生系统的资源紧张，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分裂阻碍了美国应对紧急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速度。在公共卫生作用和责任方面，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存在脱节现象。因此，在建立更坚实的卫生安全系统的道路上，美国需要分配足够的资金，应用

现有的最佳科学和新技术，消除现有的分歧，并促进政府机构和私营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威胁。

来源：
Healthy Nation, Safe Nation: Build Health Security into National Security | Wilson Center |
<https://www.rand.org/blog/2023/03/healthy-nation-safe-nation-build-health-security-into.html>

现在是防止关键材料短缺之时

■ 科技安全：关键材料安全

Doug Irving, 美国兰德公司传播分析师、兰德旗舰杂志《兰德评论》主要撰稿人。

稀土和锂等关键材料被称为未来创新的基石，稀土元素广泛存在于各类产品之中，包括手机、车辆、卫星、风力涡轮机以及各种军事设备等等，以上种种均表明稀土资源的占有量以及市场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尽管美国在 2010 年之后就开始增加稀土、锂和其他关键材料的库存，力图减少对中国稀土资源的依赖程度。但是，就目前而言，几乎所有从美国地下出来的稀土矿石最终仍然在中国加工成可用的粉末和金属，同时，中国

还加工世界上大部分的锂离子电池材料。中国正占据着全球稀土市场的主导地位，对稀土市场有着相对较高的控制地位。美国必须要制定出诸如从旧电子产品中回收关键材料等更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最大限度保障国家经济和科技安全。

来源：
The Time to Prevent Shortfalls in Critical Materials Is Now | Rand |
[https://www.rand.org/blog/rand-review/2023/03/the-time-to-prevent-shortfalls-in-critical-materials.html\(2023-3-20\)](https://www.rand.org/blog/rand-review/2023/03/the-time-to-prevent-shortfalls-in-critical-materials.html(2023-3-20))

肯尼亚旱灾：数百万美元援助下的牧民仍苦不堪言

生态安全：气候安全

Ian Scoones, 发展研究所土地及农业研究员;
Tahira Shariff Mohamed, 发展研究所人类学研究员。

面临大面积干旱和动物疾病问题，肯尼亚牧民生计问题深受重创，因此政府提出打造“复原力工程”。过去几十年来，在大量外部资助的项目和数以亿计的美元投资下，政府鼓励牧民生产现代化。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反复干旱和蝗虫灾害的冲击下，“复原力工程”没有发挥理想的作用，牧民的生计问题愈发严峻。相关研究指出，必须利用当地的实践和网络，找到从下至上建立复原力的方法，而不是大量的

外部干预，忽略了现实的社会环境导致复原力工程出现偏差。

来源:

Kenya drought: Pastoralists suffer despite millions of dollars used to protect them—what went wrong? |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https://www.ids.ac.uk/opinions/kenya-drought-pastoralists-suffer-despite-millions-of-dollars-used-to-protect-them-what-went-wrong/>

胡塞武装对也门妇女暴力镇压

文化安全：女权安全

Moammar Al-Eryani, 也门文化和信息部长。

近年来，胡塞武装绑架大量也门妇女并施以酷刑，因此也门妇女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水深火热境地。相关报告显示，从 2017 年到 2022 年，胡塞武装对妇女实施了超过 1893 起绑架、酷刑和强奸案件。然而，胡塞民兵对妇女的骚扰和压制只是问题之一。除了剥夺妇女权利的镇压措施外，也门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通过媒体和政策灌输文化意识，旨在将妇女限制为单纯的生育机器。胡塞武装的暴行对妇女在建设和

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成果构成了真正威胁。面对这些悲剧，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有责任捍卫妇女的权利，打击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来源:

Preventing the Next Kabul: Confronting the Houthi's Violent Suppression of Women in Yemen | Wilson Center |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preventing-next-kabul-confronting-houthis-violent-suppression-women-yemen>

解决关键材料短缺的时机已到

资源安全：战略性矿产安全

Doug Irving, 兰德公司新闻传媒研究员。

稀土和其他关键材料被称为未来创新的基石，在国家的生产应用中无处不在，因此美国稀土资源的短缺成为其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问题。研究发现，由于时间的紧迫性，美国现有的市场多元化计划走得不够远也不够快。一方面，美国希望逐渐减少对稀土资源大国的依赖。2022 年联邦政府宣布将投资数十亿美元支持美国的电池行业，并增强分离和加工稀土的能

力。另一方面，美国需要为供应中断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基于以上两点措施，现当下就是解决关键材料短缺的黄金时机。

来源：

The Time to Prevent Shortfalls in Critical Materials Is Now | RAND Corporation | <https://www.rand.org/blog/rand-review/2023/03/the-time-to-prevent-shortfalls-in-critical-materials.html>

愤怒的联邦法官命令拜登的国土安全部：结束非法外国人的大规模假释

社会安全：移民安全

Hans A.von Spakovsky, 美国传统基金会埃德温·米斯三世法律和司法研究中心高级法律研究员；

Lora Ries, 美国传统基金会边境安全和移民中心主任；

Steven G. Bradbury, 美国传统基金会杰出研究员。

在质疑国土安全部可信度的严厉意见中，美国佛罗里达州北区地方法院法官下令停止拜登政府的“假释加拘留替代方案”政策，该政策非法释放数十万外国人进入美国，违反了管理联邦机构制定规则的《行政程序法》。但是，拜登政府却不认可该州法官的判决，声称尽管联邦法律有强制性语言，但它有“不拘留外国人的自由裁量权”，在非法移民问题上，拜登政府的国土安全部与佛罗里达州地方法院的法官正进行激烈的斗争。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导致佛罗里达州陷入“移民危机”中，对于该州

的社会安全和稳定造成了恶劣影响。美国近期大规模的假释政策不仅违反了法律，而且还有可能帮助犯罪分子脱离法律约束。因此，国土安全部应该正视各边境州的合理需求，合法运用非法外国人的假释，保障美国的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

来源：

Angry Federal Judge Orders Biden's DHS: End Mass Parole of Illegal Aliens | Heritage | [https://www.heritage.org/immigration/commentary/angry-federal-judge-orders-bidens-dhs-end-mass-parole-illegal-aliens\(2023-3-16\)](https://www.heritage.org/immigration/commentary/angry-federal-judge-orders-bidens-dhs-end-mass-parole-illegal-aliens(2023-3-16))

IPCC 报告、联合国水会议 ... 我们还能避免全球供水危机吗？

资源安全：水资源安全

Julia Tasse, 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所 (IRIS) 研究总监。

自前工业化时代以来，地球已经升温 1.1° C，而目前所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于 3 月 20 日发布最新报告，该份报告旨在恢复在理解气候变化方面的进展及这些变化对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且探讨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降低气候风险的可用方法。这份政治和科学文件侧重于迫在眉睫的供水危机，这也是 46 年以来第一次淡水问题的国际首脑会议。以获得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为目标，这是联合国通过的《2030 年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在本届联合国水大会上多次讨论了水资源在气候变化斗争中作用，“获得水资源”多次出现在 IPCC 报告中，尤其是关于水

安全的探讨。在法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联盟，通过 S-Eau-S 运动要求马克龙总统在 2025 年组织的联合国海洋大会以及下一届海洋大会的背景下增加一个“淡水”议题，法国可以在欧洲一级发挥其独特作用。水资源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气候变化改变了降水，影响了海洋和大陆生态系统，全球必须正视目前紧迫的水资源问题，以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水资源安全问题。

来源：

Rapport du GIEC, Conférenc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au ... Peut-on encore éviter une crise mondiale de l'accès à l'eau ? [IRIS]
[https://www.iris-france.org/174698-rapport-du-giec-conference-des-nations-unies-sur-leau-peut-on-encore-eviter-une-crise-mondiale-de-lacces-a-leau/\(2023-3-24\)](https://www.iris-france.org/174698-rapport-du-giec-conference-des-nations-unies-sur-leau-peut-on-encore-eviter-une-crise-mondiale-de-lacces-a-leau/(2023-3-24))

重新思考包容性：哥伦比亚聋人集体的斗争

文化安全：人权安全

Ana Palma Garcia, 发展研究所社会变革研究员。

当公众习惯于把包容性定义为无障碍的世界时，世界各地的聋哑人群体在推动这种认识论的转变，提出包容性是拥抱聋哑人的积极价值而不是试图治愈或同化它。在哥伦比亚，第一部涉及残疾人权利的无障碍法律和第一部正式承认手语的法律存在较大的前后时间差。但哥伦比亚的聋哑人群体认为政府正式承认手语

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希望实现对聋人文化的认同，制定包容聋哑人的政策，保护手语发展并促进聋哑人身份认同。

来源：

To radically rethink inclusion: the fight of deaf collectives in Colombia |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https://www.ids.ac.uk/opinions/to-radically-rethink-inclusion-the-fight-of-deaf-collectives-in-colombia/>

2 前沿研究

食物是武器？粮食地缘政治和卡塔尔 - 海湾裂痕

Natalie Koch

自 2017 年以来，卡塔尔深受禁运影响，并直接损害卡塔尔的粮食供应。本文通过分析食品的地缘政治作为权力话语，借此批判地缘政治的理论和方法论。

自卡塔尔禁运，关于食品的证券化话语在整个阿拉伯半岛重新兴起，粮食安全与全球霸权设想交织在一起，具有依赖关系。领土主权、国家脆弱性和粮食供应链的不稳定、不完整性都可能成为政治对抗的攻击场所。

其次，长期以来食物、水和能源一直与主权和安全的概念以及支撑它们的物质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概念必然会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批判地缘政治的建构主义视角所关注的正是这些证券化和民族主义话语的转变性质。在此话语体系下，粮食证券化似乎合理，且在海湾地区存在了较长的时间，但实际上粮食并不是一个容易利用的工具，使用其常伴随着高昂的代价。

本文通过对卡塔尔地区的实际考察发现，尽管该国的粮食生产无法自给自足，但其高科

技农业举措仍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对于粮食工具的干预和使用可以使一国把注意力从原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的情况上转移，民族主义国家能够运用独立的愿望证明其有能力应对部分情况。

本文认为，粮食地缘政治的问题会影响一国的外交策略与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内向的民族主义想象相反，民族主义对粮食安全或独立的渴望实际上是一种外部联系，寻找新的贸易联系和政治伙伴关系是此类国家政府应对禁运和食品证券化的决定性特征。

来源：

Food as a weapon? The geopolitics of food and the Qatar-Gulf rift
Security Dialogue 2021, Vol. 52(2) 118-134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67010620912353>

编译：许汶

在环境框架之外考虑平流层气溶胶注入： 可理解的“紧急”技术修复和先发制人的安全

Danielle N. Young

随着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后果的加剧，寻找潜在解决方案和适应办法的工作也在加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将全球气温上升保持在危险阈值以下的政治困难，增加了人们对太阳能地球工程作为控制全球气温的技术干预的兴趣，特别是平流层气溶胶注入 (SAI)。SAI 包括向平流层喷洒反射粒子，以部分地阻挡或反射入射的太阳辐射，它被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以争取时间来减少大气温室气体，完成远离化石燃料的系统性能源转型。

文章指出，国际关系对 SAI 的少量关注通常集中在对技术治理的需求上，并假定技术发展和使用主要由对气候影响的脆弱性所驱动。通过对常见安全假设和先发制人的安全框架的分析，本文表明，虽然目前对 SAI 的评估侧重于技术的环境影响，但更广泛的政治和安全动态，特别是希望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安全问题的加以解决的愿望，可能对该技术的使用方式和对象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认为，除了对技术的潜在气候学评估之外，还有一些政治和安全动态没有得到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可能为管理不善的 SAI 开发和使用创造条件。首先，SAI 作为一种技术干预的性质可能有助于使气候变化更容易被理解为一个政治问题，这反过来可能使气候变化在政治上更具可操作性。这对于迄今为止相对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行为体来说可能尤其重要。第二，越

来越普遍地将气候变化视为紧急情况，这可能会使 SAI 等气候干预措施与先发制人的安全逻辑相一致。这种逻辑通常采取紧急措施来管理威胁，而没有充分考虑潜在后果，这可能涉及一场控制行星级技术干预的竞赛。此外，文章指出，在先发制人的安全背景下，SAI 技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将不是关于其使用的决策的组成部分。不管国际上的反对意见或是否达到任何科学确定的气候紧急情况阈值，技术本身的存在就为其部署提供理由。

本文主要贡献是在狭窄的环境框架外扩大了 SAI 评估的范围，并初步分析了技术可理解性和先发制人的安全逻辑和实践如何影响 SAI 的发展和使用。基于更实质性的政治和安全思维所提供的分析，有理由对 SAI 的政治和安全影响进行更多研究，不仅是其直接环境影响和那些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行为体。先发制人安全措施的影响、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反应的吸引力、以及在更传统问题 / 解决方案框架内对气候变化的反应的可理解性的愿望，都需要更多研究。

来源：

Considering stratospheric aerosol injections beyond an environmental frame: The intelligible 'emergency' techno-fix and preemptive secur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3), page 1 of 19, doi:10.1017/eis.2023.4

编译：何香凝

Ricardo Francisco Reier Forradellas： 面对新冠流行经济危机的央行货币 政策

银行已经宣布了一系列救济措施来应对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首先，作为储蓄和投资渠道，银行机构是维系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部分。因强制提高税收、施加限制而将银行视为敌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实际上这些后果最终将由客户来承担。需要注意的是，在银行业中，与 2007 年的金融危机（该危机对欧洲的影响主要显现在 2008 年以后）和随后的债务危机所遭受的影响相比，新冠流行所产生的影响要小得多。在 2007-2008 年的危机中，尽管公共当局、立法者、监管机构等也应当负起责任，但金融和银行业仍是解决危机引发的全球混乱的主力。在这场新冠引发的新灾难中，银行被认为是缓解疫情影响、实现快速经济复苏的必要机制之一。例

如，在大流行期间，西班牙银行与国家及其信贷线合作，为超过 750,000 家公司和个体经营者动员了近 1400 亿欧元的融资。事实上，货币当局在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乌克兰战争、股市崩盘等因素共同导致了一个通货膨胀过程，这个过程“震惊”了许多经济体。通货膨胀导致利率上升，由此引发经济层面最危险的情况之一：通货膨胀和高利率。

金融机构在应对 2008 年危机后所做的调整和准备，使得该行业相对更具备抵御如此规模大流行病的能力，但并不排除该行业在 2019 年已面临一些风险，例如资产负债表、债务、成本、业务和尤其是盈利能力问题。大流行病进一步“削弱”了银行运营商的收入表

现。这种趋势因疫情的恶化和在近年来异常低利率的情况，已经变得明显可见。在盈利方面，需要考虑到疫情对家庭和企业产生的影响，以及付款延期措施和信贷违约率的增加。

对西班牙而言，盈利能力下降让银行不得不采用数字渠道策略（大量减少银行线下业

特邀学者



Ricardo Francisco Reier Forradellas 博士现任西班牙阿维拉天主教大学教授、阿维拉商学院院长。在大学教育和企业管理方面有超过 12 年的经验，专注于商业和管理、可持续发展、经济分析、数字活动商业战略等领域。著作：《中央银行面对新冠流行经济危机时的货币政策：货币刺激措施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出现》《基于学生数字孪生的道德分类的预测机器学习模型在大学环境中的应用的商业方法》。

作为席卷全球的危机事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给经济领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震荡。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中心机构，各大中央银行出台了相应的货币政策，以应对危机，调动发展活力。银行机构在危机应对中主要扮演何种角色？危机应对措施如何中和金融环境变化？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呈现何种趋势？针对这些问题，中心与 Ricardo Francisco 进行专访，以中央银行应对新冠危机的货币政策为主题，了解他的看法。

务)，并向违反规定的客户征收更多的佣金和费用。银行的分支机构也将面临关闭和集体裁员。在我看来，新一轮的银行集中化进程是不可避免的。银行行业的整合将成为现实，其标志是通过合并来增加盈利能力和业务规模，以便在新技术和银行数字化的环境中正常运营。同样，这些合并或集中不仅由银行自身的竞争利益所驱动，还是银行当局所施加的措施和规定的结果。最后，新

竞争对手的出现也将影响银行业未来的盈利能力。事实上，该行业面临的机遇之一是将“金融科技”作为潜在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潜在的竞争对手，以寻求新的盈利公式。也许最大的挑战在于所谓的大型科技公司，因为它们拥有大量的客户数据库，高度忠诚的用户，并有可能成为“大型科技银行”。

翻译：龙亦讯



Amy Erica Smith: 身份认同对巴西选举的影响

在 Layton 等人的著作 (2021) 中，作者关注了三种身份：种族、性别和宗教。Smith 教授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最后一个方面，即宗教。尽管福音派、天主教和非宗教身份的分歧并不严重，但它们仍长期存在于巴西社会。然而，除了一些特殊情况，这些分歧并没有强烈和持续地影响人们的选举选择。在一些选举中，福音派教徒会投给天主教徒偏右的选票，而在另一些选举中则会投给偏左的选票；其中有一个一贯的模式是，人们倾向于支持来自自己宗教团体的候选人。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福音派教徒越来越多地成为右翼候选人的坚实支持基础，而非宗教人士则成为左翼候选人的坚实支持基础。正如泰勒·博阿斯 (Taylor Boas) 和 Smith 教授在一篇工作论文 (Smith and Boas 2021) 中所表

明的那样，在整个拉丁美洲，福音派作为右翼支持基础的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政治问题 (如 LGBTQ 权利和堕胎) 在政治议程上上升的结果。当报纸和政客们越来越强调这些问题时，宗教和文化保守派在投票站变成了政治保守派。Smith 和博阿斯的暗示是，新闻媒体对于激活潜在的分裂很重要。此外，Smith 教授 2019 年的书显示，教会社区在这一过程中有助于塑造或强化人们的身份认同 (Smith 2019)，而 Matheus Ferreira, Mario Fuks 和她的书显示了社交媒体的进一步重要性 (Ferreira et al. 2023)。

关于文化分歧，在 Smith 教授看来，选举中的文化分歧是民意和政治偏好的真实反映。因为宗教社区与稳定的、长期的问题偏好有关，这有助于形成政治分歧。尽管如此，文化分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精



Amy Erica Smith 是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也是文科和理学院院长教授。Smith 教授的研究考察了普通人如何理解和参与政治。她的主要专长是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她的著作包括：《宗教与巴西民主：动员上帝的子民》，《说出来：不平等背景下的政治对话和学习》。

鉴于教授对巴西政治活动的了解，中心就巴西大选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Amy Erica Smith 教授曾深刻地提到，2018 年的选举可能标志着一个更加两极分化的政治舞台的开始，在这个舞台上，人们根据身份划分自己的政治派别。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因素 (例如，媒体或政治机构) 帮助塑造或强化人们的身份。针对可能在选举过程中产生影响的人们的身份认同、文化划分以及当今世界中的政治两极化趋势，中心采访了 Amy Erica Smith，了解她的相关看法。

英们政治博弈的结果，政治家们通过他们的言论来突出和激活问题分歧。然而，最终导致分歧的是大众的观点，而他们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则不是主要原因。

在谈到巴西总统选举将出现的新趋势时，Smith 教授说，我们可以预期，巴西的文化右翼将继续强烈强调“文化战争”问题，如性别、性取向和堕胎，以获得政治利益。此外，我们

可能会看到强调与种族有关的问题，尽管这是一个右翼不太可能在公众舆论中始终具有优势的领域。

翻译：周雅淇



谢贵平 章雅荻： 和合共治：外部非传统安全威胁 应对的中国智慧与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同时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深度全球化时代，随着商品、资本、信息、人员、技术与现代化交通工具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加速流动，人类面临的各种非传统安全¹风险与挑战也越来越多。各种非传统安全更多地表现为跨国性的人类安全与共同安全，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家安全、区域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主要内容，并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与核心内容。当前，大国地缘

政治博弈日趋激烈，世界经济秩序呈现前所未有的脱序状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²我国除了面临传统安全风险之外，同时面临各类自然性、人为性及自然与人为复合性的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挑战。一些高度外溢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超越了国家间主权的边界，仅靠单一国家主体无法解决。新形势下，我们不仅需要从中国古代“和合主义”思想文化里汲取智慧，而且需

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树立全球安全和全球发展意识，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合共治，必要时对敌对行为进行反制和反击，才

1 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传统安全而言。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安全观认为传统安全，是指主权国家如何抵御外来军事干涉和入侵，防止核战争以及维护民族独立、领土完整方面的问题。传统安全强调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安全互动，在手段上特别强调军事力量。本文结合前人的相关研究认为，非传统安全主要是指非军事武力安全，一切非军事武力的安全问题都是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的目标是对国家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等根本利益的维护，涉及军事安全以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诸多领域中的问题。但是在深度全球化时代，随着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大国之间战略博弈策略的转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边界日益模糊，二者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互为转化，甚至互为目的和手段。参见李东燕：《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第49-54页；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39-146页。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研究员介绍



谢贵平，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研究院团队成员。

章雅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新时期，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代“和合主义”思想文化里汲取智慧，更需要与时俱进，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树立全球安全、全球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安全互保、风险共担、命运共同”机制，推进国际社会和合共治；对破坏和侵犯我国家利益、威胁我国家安全的行为，我们也需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采取反制和反击措施，才能有效维护和塑造我国总体国家安全。

能有效维护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

一、当前我国面临外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特征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气候变暖、环境污染、金融危机、经济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跨界资源冲突、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难民问题、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流行性疾病、海洋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人员、物流、资本、信息、技术和现代化交通工具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高频次流动，各国交往日益密切，给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外溢创造了条件。一些大国国家安全战略和手段方式也进行相应的升级转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手段方式交替并用，互为目的和手段，使得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边界日益模糊。就全球安全而言，虽然以战争武力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安全威胁局部存在，但总体上日渐式微。受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国际暴恐势力袭击，美

西方为围堵、遏制和打压我国和平发展和崛起而推行“以疆乱华”“以藏制华”“以台制华”等战略，美西方对我高新科技和产业进行封锁和打压等因素影响，我国面临诸多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传统安全的“非传统化”

一是安全内容的“非传统化”。如美国为了达到“以台制华”目的，多次派政客窜访台湾地区、舰艇穿越台湾海峡、电子侦察机进入我领空进行电子侦察、向台湾地区出售军事武器，企图实现消耗我国战略资源的目的。二是安全形式的“非传统化”。首先是“非军事化”。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化混合战争已不再只是军事领域的单一维度对抗，而是延伸至经济、科技、文化、社会与信息等多领域的多维对抗，如美西方一些国家对华实施“舆论战”“网络战”“认知战”等。其次是“低政治化”。安全的指涉对象扩展到了空气、水、环境、能源、粮食、公共卫生、信息、网络等“低政治”领域，而且这

些“低政治”领域的安全问题经常性地进入国家重要安全议程，如美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实施的芯片战“科技战”“人才战”及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就涵盖科技、教育与文化等领域。最后是“非对称化”。恐怖主义袭击、网络攻击等很多都是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行为体的不对称“式”挑战，如我国在国外一些地区工程项目和人员等面临的恐怖主义袭击等。三是安全结果的“非传统化”。相对于传统安全具有相对明确的威胁对象而言，非传统安全则难以有相对明确的威胁对象，安全结果更多的是针对不特定人群的“普遍性危害”。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甚至还是一种具有未来可能性的“未知的未知风险”（unknown-unknown risk），它的危害影响可以跨越“代际”，因而其破坏性后果更是难以估量的。³如外来有害生物包括微生物“入侵”和疫病疫情的输入，对我国经贸安全、国民生命健康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都带来严重危害。

（二）非传统安全的复杂

性

一是安全问题的复杂性。非传统安全既与战争、威慑相关联，又与主权、政权、人权相关联，还与风险、突发事件、危机相关联；既包括自然性安全，也包括人为性安全，还包括自然与人为复合性安全问题，如美西方对我新疆、西藏等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破坏和推行“颜色革命”导致一些民众思想受到毒害就是主观安全问题，“一带一路”沿线我国工程项目、人员等受到暴恐袭击就是客观安全问题，外来有害生物和疫病疫情“入侵”或入境既可能是有害生物和疫病疫情的自然传播，也可能是人为蓄意恶意地传播，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更多的是自然和人为复合性的安全问题；既包括地方性与全国性安全，也包括跨国性、区域性、国际性与全球性安全，如外来疫病疫情的输入极可能造成地方性与全国性的疫病疫情，也可能造成跨国性、区域性、国际性与全球性疫病疫情。这些非传统安全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历史问

题与现实问题、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互交织，直接威胁与间接威胁并存，显在威胁与潜在威胁共生，多元叠合，相互影响。二是安全场域的多样性。各种非传统安全风险、隐患、危机、威胁、灾害、灾难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关涉到地缘、认同、利益、网络、话语、价值等不同场域。如美国在我国周边推行印太战略及中亚新战略等，就威胁到我国周边地缘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和外海利益及安全等；其在国际社会抹黑我国国家形象、损害我国国际声誉威胁到我国边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民众的国家认同安全；其对我实施的“经济战”“贸易战”“与中国脱钩”“去中国化”使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利益受损；其“网络战”攻击我国重要部门和机构、窃取我国相关涉密数据和信息，并通过网络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破坏，对我网络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其“舆论战”“认知战”搅乱国际和国内社会及民众对我国

³ 余潇枫：《跨越边界：人类安全的现实挑战与未来图景——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解析》，载《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第6期，第16页。

政府的错误认知,使我国在国际社会缺少一定的话语权;其意识形态渗透严重侵蚀了我国一些民众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非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威胁主体的多元性。制造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体既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集体的社会组织或集团,也可能是个人。有的威胁主体清晰明确,如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中印边境领土的冲突与对抗;有的威胁主体模糊,如我国海外利益遭受侵犯、袭击和破坏,其威胁的主体既可能是地方武装,也可能是有组织的恐怖组织,还可能是当地的军事政变力量及一般的犯罪团伙,而威胁对象则包括个人、群体、机构、项目工程等。四是诱发因素的交互性。首先,受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而激化国内社会矛盾,如香港地区由于长期受美西方的思想渗透,一些青少年群体思想受到毒害而致香港地区曾发生多次骚乱事件。其次,国内社会矛盾不能妥善解决而招致外部势力的渗透、介入而引发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我国新疆、西藏等边境

民族地区一些社会问题没有妥善处理好,极易被境外敌对势力挑唆利用,以挑拨一些少数民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危机。

(三) 非传统安全的转换性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不是二元对立和边界清晰,而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与相互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能互为目的和手段。一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如应对境外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就可能需要动用军事力量进行打击与防控;保护中国海上能源和商贸航线上的商船和运输通道、打击沿线的海盗就可能需要动用远洋海军力量护航;打击各类跨国非法武器贩运及毒品贩卖等有组织犯罪在特定情况下也需要动用军事力量进行有效参与。二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互为转换。首先,传统安全威胁可能次生、衍生非传统安全威胁,如俄乌军事冲突引发了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与半导体原材料供应链安全问题,并严重影响到我国在俄乌两国、中东欧乃至整个欧洲地区

的营商环境安全。其次,在特定条件下,非传统安全威胁可能升级为传统军事安全冲突,如美国及其盟友长期对朝鲜实施经济、贸易、粮食、科技等制裁,并多次举行针对朝鲜的联合军事演习,极易引发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冲突;再如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实施全面围堵和遏制及打压,并通过种种非传统安全手段推行“以台制华”战略,可能引发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局部军事冲突乃至中美之间的局部军事冲突风险。三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互为目的和手段。首先,可以用传统安全手段达到非传统安全目的,如美国在我南海和台海等地区制造军事冲突危机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和霸权利益。其次,通过非传统安全手段达到传统安全目的,如美国企图对我实施“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信息战”“认知战”等非传统安全手段达到来实现其传统安全难以实现的目标,即遏制、打压和破坏我国和平发展和崛起乃至分裂我国。

二、我国外部非传统安全威胁治理的现实困境

我国外部非传统安全威胁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主要与外来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的显在危机和潜在危机及危害隐蔽性强、潜伏期长、破坏性大、难以引起决策层高度重视有关，更与相涉国家间的信任缺失与认同危机以及不同国家战略利益诉求存有分歧而导致国际合作难以展开有关。

（一）一些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尽管破坏性大但是隐蔽性强，难以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非传统安全威胁常以非军事武力、非直接对抗、非杀伤流血、非对称博弈、非透明公开等方式，对遭受国或给受攻击国带来巨大灾害及各种人道主义灾难，甚至造成全民乃至代际的侵害。特别是非传统的新型战争并非领土与主权之争，而是一种隐蔽的利益争夺与综合国力的博弈。如生物战“基因战”“病毒战”“网络战”等隐蔽性强、爆发性快、致害性高、

破坏性大，能以较小成本引发大规模的人和动植物疫病疫情，对他国特定领域和目标造成致命性、摧毁性、灾难性破坏。各种有害生物和疫病疫情“入侵”“入境”、文化渗透、“科技战”“贸易战”“金融战”“认知战”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对我国经济发展、公共卫生、国民健康、金融贸易、生态物种、社会稳定、政权巩固、文化根基、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与整体性、持续性的侵蚀与危害，还能通过现代媒介的广泛传播，引发社会恐慌。

但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体身份难以确定、威胁源头难以判定、威胁方式难以取证、威胁过程难以追踪。特别是一些大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形态、手段、方式已经发生极大改变，超越了大多数人的认知范围，尤其是高科技的广泛使用，一些“非传统战争”正朝着非传统、隐形、致命、快速、不留痕迹、难以查证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由于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的系统研究和科普

教育的相对缺失，一些民众对非传统安全的历史和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缺少清醒认识，缺少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忧患和危机意识。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无形的、隐蔽的、潜在的乃至代际性的巨大危害，往往难以被民众所认知，也难以及时进入国家治理的决策视域，极易错失治理的最佳时机，从而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和损害乃至灾难，也给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实践带来诸多难题与困境。

（二）与国际社会协力应对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面临巨大挑战

1. 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国际合作难开展。在深度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村”，国内问题极易国际化，国际问题也极易国内化，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安危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各种非传统安全更多地表现为跨国性的人类安全、国际安全、区域安全等公共安全，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与核心内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影响和破坏的跨国性、

整体性、公共性、突发性、多变性、复合性、交织性、动态性，并非单个国家所能解决，需要人类社会、国际社会与区域社会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及协力共治。但是当前国际社会逆全球化思潮抬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盛行，特别是美国将我国看作是对现有国际秩序和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挑战者，把我国视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和假想敌。其他一些国家也对我国的“崛起”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担忧，对我国大多抱有疑虑、防范与戒备心理，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极易被他国利用，使得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国际合作难以开展。

2. 信任缺失与认同危机是我国与国际社会和合共治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障碍。价值观念差异与异质文明冲突极易使一些国家对我国“和合共治”范式的信任缺失。全球多国分属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众多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不同文明形态，以及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发展历程等方面的差异，妨碍国际社会共同身份的建构与认同。这些异质性的差异性会使国际社会与我国缺乏价值共识，进而造成一些国家将我国视为“他者”，且在政治决策方面与我国缺乏相容性。一些国家受历史情感、民粹主义、思维定势、传统认知与利益分配等问题的影响，对“和合共治”的目标、理念及模式持有认知偏误、质疑与拒斥态度；一些西方国家自视为人类优秀文化代表、先进文明核心，以自身的文化透镜来审视、评判、质疑我国的“和合共治”倡议，担心我国可能会通过非传统安全的和合共治倡议来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而削弱他们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挑战美国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而对我国的“和合共治”范式持不合作甚至反对态度。

3. 不同国家战略利益诉求存有分歧是和合共治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原因。“只要这个世界在政治上由国家组成，国家利益在世界政治中就具有决定意义。”⁴ 在无政府的

国际社会，国家大多“只按照自身的利益行动，不会把自己的利益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利益”。⁵ 国家大多基于个体理性而非集体理性来决定参与逻辑和行动策略，偏于追求相对获益、自身利益而非绝对获益、共同利益。导致部分中小国家即使参与和合共治的国际机制也主要是想通过“搭便车”以享受多边主义的利益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担心对我国产生依附而失去独立性、自主性；还有一些国家担心一旦参与我国倡导的和合共治会危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如作为大国的美国、日本、印度担忧践行我国倡导的和合共治可能引发国际格局变动、国际秩序变革、地缘政治形势变化而影响其“霸权”利益或自身利益。这些都可能会使得我国倡导的和合共治难以充分协调彼此的利益诉求、化解相互间的利益分歧，难以寻求自我利益与他者利益的交汇点、相通处。

基于上述等原因，尽管我国面临的一些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全球或国际社会或区域

4 [美] 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林伟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5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6页。

社会共同的威胁，和合共治有利于维护共同利益，但是除了部分国家认可认同并积极参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和合共治之外，我国倡导的和合共治理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可能仍然面临一些难题挑战：一是部分中小国家可能表面上认同和接纳我国倡导的和合共治倡议，但实际上利用我国的和合共治倡议谋取一己之私而不愿因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二是部分地区大国可能更多的会明确反对我国倡导的和合共治，如日本和印度等；三是少数霸权国家不仅不认可、不认同中国倡导的和合共治理念，还可能利用我国倡导的包容、开放、互惠的和合共治方略，通过推行“与中国脱钩”“去中国化”战略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遏制和打压。

三、和合共治：我国外部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的应然选择

“和合”一词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篇的“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为多元协和统一，放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可以理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⁶“共生”最初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一起生活的生物体间具有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物质联系”⁷，强调主体间的共生、协作、互利、共同进化的相互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前提与基础，社会共生是人们交往的基本存在方式，⁸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和合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和合共生。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立场和带有对抗性、排他性的零和博弈及安全自保理念与“篱笆墙”“防火墙”式的安全治理方式已难以有效应对新形势下人类面临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挑战，甚至给全球治理带来诸多安全困境，人类急需一种新的安全治理理念与体系，⁹“需要超越传统国家

边界的方式，为实现共同的安全与稳定、和平及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由各类行为体通过沟通、协商、合作的方式予以解决”¹⁰。

（一）和合共治的中国智慧及其理论内核：“天下”“关系”“中庸”

随着西方全球历史、全球政治、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西方的理论范式是“国家—国际—全球”，而“天下观”政治秩序则是“天下—国际—国家”。中国政治以“天下”为出发点审视国家和社会，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天下观强调把世界当作一个政治分析单位，这与西方以“国家”为出发点的政治思想截然不同。深度全球化引发诸多世界性新难题已经无法在“国家—国际”这一框架中被有效分析，若用“天下”这一种强大的分析

6 向世陵：《“和合”义解》，载《哲学动态》2019年第3期，第62页。

7 Gloria Robinson, De Bary, (Heinrich) Anton.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p. 611-614.

8 胡守钧：《国际共生论》，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35-42页。

9 Bates Gill. The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Meeting Tomorrow's Challenges with Yesterday's Tools [J]. SIPRI, 2011, <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essay/2011/global-security-governance-system-meeting-tomorrows-challenges-yesterdays-tools>.

10 肖欢容、张沙沙：《全球安全治理的缘起及挑战》，载《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第213页。

框架去思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则可为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难题提供新的思路。¹¹因此，有必要把“国家—国际理论”扩大为“世界—国际—国家理论”。“天下无外”的原则将世界预设为一个整体性的存在，那么天下体系就只有内部性而没有外部性，即没有一个人、民族或国家被认为是外部敌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被纳入“天下”这一共在秩序中。¹²用“以天下观天下”的方法论去思考全球治理，用高于并且大于民族国家或地区的视野去理解全球议题，可使得全球治理更具有开放性、多样性与包容性。

在认识论层面上，和合共治遵循互助逻辑、关系理性而不是自助逻辑。互助是多次行为的组合，在互助的过程中建立信任、消除误解和错觉。互助反映的也是一种整体性观念，这与西方个体性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霍布斯所描述的

自然状态是“人人互相为敌”，由此延伸出的是自助逻辑，并流行于现有的全球治理实践之中。而儒家强调的是关系性，个体的成功与体现要建立在群体成员相互帮助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社群世界主义。¹³关系理性有两个重要原则：相互伤害最小化和相互利益最大化。¹⁴出于生存需要，人们一开始就必须要有合作关系，即一开始就有“群”的存在，共存是任何一个个体得以存活的条件。¹⁵

在方法论操作上，和合共治采用的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辩证法。中庸并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折衷主义，而是一种适度主义，用来化解矛盾、调节关系、促进融合以达到“和”的最高境界。但中庸并不是只讲事物的同，而不讲事物的异。中庸是通过把握事物各方面的联结、平衡、调和的关系，寻找出最佳状态，在不同、矛盾甚至冲突的基础上协调、协商而达到“和”，是动态的。中庸

强调的是凡事把握度才是事物的性质，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程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关系就是典型的非二元对立关系，阴阳两极在互动实践中，通过相互协调、相互包容、相互转化，达到共同生长的自然和谐状态，对于尊重差异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¹⁶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而不同，以包容和尊重的方式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样的治理理念更具有全球正义性，可有效破除西方二元对立认识论，消解异质性冲突。

（二）“和合共治”的中国范式与思想价值：对西方“权力型治理”和“制度型治理”的超越

受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刻影响，全球安全治理经过几十年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以权力型治理与制度型治理为代表的两种治理模式。权力型治理模式以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

11 巴里·布赞：《全球气候治理：中国的黄金机遇》，载《国际展望》2021年第6期，第5页。

12 赵汀阳：《天下观与新天下体系》，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72页。

13 高奇琦：《社群世界主义：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29页。

14 赵汀阳：《天下观与新天下体系》，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73页。

15 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58页。

16 刘擎：《重建全球想象》，载《学术月刊》2015年第8期，第11页。

者科克伦¹⁷、吉尔平¹⁸以及达菲尔德¹⁹为代表,将国家视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治理单元,强调国家、权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霸权稳定论正是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认为某一个霸权国或领导者的权威引领作用并起着“全球支配作用”。²⁰近年来,在全球安全治理实践中,权力型治理日益呈趋“极化”,美国随意违背现有的国际准则与契约精神,在处理国际安全事务中以自我为中心,退出或挑战现行的国际规则,坚持“本国优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非国家行为体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助长了各自为政的单边主义和“伪多边主义”行动,消解了全球安全协同共治的合力。

制度型治理主要以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国家不再是治理的唯一中心

或主体,²¹于是转而关注国家之外其他主体的作用,如跨国专家网络、知识精英、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并强调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²²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利己的且是理性的,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益,建立各方愿意遵守的国际制度,并依靠国际制度而展开合作,维持国际秩序以达成有效的全球治理。然而事实却是国际社会仍充斥着西方统治世界的帝国时代遗留的霸权与地位不平等现象。²³全球治理体系中重要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货币金融机构等采用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投票权制度。²⁴这直接导致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得不到充分体现。导致当

前的制度型治理逐渐呈现出“弱化”趋势:一是一些大国通过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强行对全球治理的多元参与主体进行区分,意图打造闭合排他性的全球治理领域的联盟,最后陷入俱乐部制度主义的困境。²⁵二是主导大国利用国际组织如G7、五眼联盟、北约、四国集团等排挤他国,搞对立对抗,使得国际组织在安全治理中的功能与作用不断退化,最后沦为西方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三是制度治理强调国家的绝对理性与自利,认为任何形式的合作都是基于纯粹的利益与算计,忽视了全球安全治理实践中的伦理、道德、文化等其他因素。

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认为,国际体系是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西方现代政治框架是由“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而定义的,国家是最大

17 Cochrane F, Duffy R, Selby J. Global Governanc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M].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3.

18 Cochrane F, Duffy R, Selby J. Global Governanc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M].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3.

19 Duffield M R.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New Wars[J].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2014, 15(3):120-121.

20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21 Cerny P G. The Government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Z]. 2008; Stone D. Global Public Policy, Transnational Policy Communities and Their Networks[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08, 36(1):19-38.

22 O'Brien, Robert. Contesting Global Governa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 詹森海耶斯、保罗刘易斯、伊恩克拉克、海燕飞:《资本主义多样性、新自由主义与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载《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8期,第2页。

24 徐秀军:《金砖国家与全球治理模式创新》,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11期,第43页。

25 丑则静:《维护践行多边主义,破解全球治理之困》,载《红旗文稿》2021年第10期,第45页。

的主权单位。²⁶ 这样的政治框架无疑缺少世界政治制度理念以及全球观照。坚持以本国利益出发,以国家为单位出发治理全球安全问题,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下互通、流动的世界。以整体关系主义为认识论的和合共治,用“天下”的概念来理解人类社会,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可穷尽一切的关系网络,更看重“关系理性”而非“个体理性”,将世界内部化,摒弃传统国际政治内外划界、我与他对立的思维模式。²⁷ 遵循互助逻辑而不是自助逻辑,追求基于跨文明对话和合作的文化范式,达到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想境界。²⁸ 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整体性、融合性、开放性的视角,能较好地超越不同行为体、议题、要素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是对西方“权力型治理”和“制度型治理”的超越。

各种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治理需要多个跨国行为体协力应对,但是现有国际安全治理

体系难以有效应对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效应对外部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型治理与制度型治理模式的局限,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汲取智慧。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的“和合共治”,其伦理向度是全球中心主义,其最佳方案是“多元多边合作”,²⁹ 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性的合作治理状态,也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治理的应然选择。尽管和合共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在不断探索之中,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未来任何实践的探索都是理念先行。

四、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合共治的方略路径

以“和平共处、和合共生、合作共赢”为核心内容的和合主义价值范式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整体观、包容观、共存观、大同观,可以整合各方文化、融通不同价值、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识。新

时期,应对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我们需要在汲取中国传统和合主义思想文化智慧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加强国际合作,达成国家间、区域间、国际间认同,形成多边多元合作治理框架,推进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和合共治。

(一)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加强国际合作,探索建构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合共治的中国范式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国际与国内。在国际层面,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和全球发展观及“安全互保、权责共担、义利并举、和合共治、命运共同”理念。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目标,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原则,以维护公平正义、推动互利共赢为宗旨,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

26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 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2期,第14页。

28 刘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载《学术月刊》2015年第8期,第7页。

29 余潇枫、王梦婷:《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一种跨国安全治理的新探索》,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1期,第4、13-16页。

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³⁰，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式的对话、沟通、协商与谈判，努力推进和实现双边和多边的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推进“共商、共建、共创、共赢、共享”的全球安全文明建设，推动国家间、地区间、国际间达成多边多元合作协同共治框架，携手应对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挑战，共同消解人类安全困境。

（二）深化国际社会的战略互信，增强国际社会的“我们感”

在国际关系领域，决定国家间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的首要因素是信任能否建立，且信任程度与合作程度成正相关关系。³¹ 在国际政治中，信任是国家间交往与合作的“稳定剂”，也是国际社会走向理想秩序的“钥匙”。³² 我们需要树立和合主义价值理念，奉行“双赢、多赢、共赢”原则，高举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相关国家“拆高墙”“建大院”，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协商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以经贸互利促进经济互惠，以利益互嵌推进共建共享，以文化互融共塑价值认同，以包容互促融通战略竞合，以风险共担达成安全互保，携手应对共同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推进以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为主要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探寻人类社会、国际社会与区域社会和合共治的契合点、共通处、一致性，聚同化异；建构国际社会“合作方、互惠者、自己人、共同体”等共同身份及合作伙伴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我们感”，促进彼此利益的交汇、趋同，最大化经济效益和安全效益，增强国际社会和合共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义务共负认同感与

响应度，推动相涉国家间由“互争”走向“互补”、由“独治”走向“共治”。

（三）推动国际社会和合共治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相关机制、制度和规范建设

共同利益可以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则需要通过相关机制、制度和规范去完成。首先，制度是保证合作的有效机制，它具有权威性、制约性、关联性的特点，能够界定行为规范、制约行为体活动、帮助行为体的期望值趋同；³³ 规范是界定行为体权利和义务的标准，它具有规定和限定行动的功能，有助于推动行为体的行为合法化、协调不同行为体的期望、减少不确定性。其次，制度和规范能够界定、建构集体认同和共同利益，促进彼此信任的形成，并激发彼此对共同命运的信仰；同时，它们有助于行为体形成共同体意识，也可以为共同体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框架。³⁴ 最后，制度和规

30 胡正荣：《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赏》，载《人民日报》2022年9月7日第9版。

3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001版。

32 王日华：《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及其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第101页。

33 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载《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43页。

34 阿米塔夫·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范是共同体的两大核心要素，其中规范是共同体的决定因素和行为体的行动纲领，制度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建构过程；³⁵集体认同和共同体的形成往往建立在成员国按照相关规范和制度约束自身行为的基础上，合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往往标志着共同体开始形成。³⁶因而，我国与国际社会和合共治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除了需要国家间加强合作之外，还需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加强和拓展地方政府、国际组织、媒体、智库、社团、学术团体等多行为体间的多边多元的对话、交流、协商、谈判，借鉴东盟、南盟、上合组织、澜湄河流域等合作机制，建立开放性、包容性的双边和多边和合共治的机制、制度和规范建设，以为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共进、

有序运行及和合共治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平台和条件。

（四）对不同态度立场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推行分类应对和灵活施策

根据不同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和合共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同态度和行动，实施分类应对和灵活施策。针对热切响应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我们需要加强全面合作，共建一个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协同共治大平台，以成就来推进和合共赢”针对持徘徊观望态度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我们需要加强交流和共同研讨及重点合作，探讨合作共治与共赢的可行性方案；针对持犹豫怀疑态度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我们需要加强相互接触与沟通，在增信释疑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找共同合作的突破口；针对持抵制心态的国家，我们则需要主动释疑，寻求利益交汇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寻找平等合作的可能性；针对别有用心试图利用我国的和平外交和睦邻友好政

策、通过对华挑拨制造危机或妄图进行遏制、围堵、打压和破坏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国家，我们则需要直接面对，敦促其改变冷战思维，对于那些故意、蓄意、恶意和敌意破坏我国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治理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我国需要研究和采取系列反制和反击措施制止其敌意行为或倒逼其放弃反华政策。³⁷

（五）加强反制和威慑能力建设，为我国应对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支撑和保障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家和地区大国，以“自由世界领导者”自居，联手所谓的“民主”国家组建“民主国家联盟”，滥用制裁手段破坏国际规则，拉帮结派，制造政治集团的阵营对立和冲突，并通过各种非传统安全手段，抹黑我国国际形象，损害我国国际声誉，全面围堵、遏制和打压我国和平发展和崛起，毫不掩饰地制造贸易壁垒，推行“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我们倡导和合

第30-33页。

35 魏玲：《规范·制度·共同体——东亚合作的架构与方向》，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68-69页。

36 参见刘兴华：《非传统安全与共同体建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41页；余潇枫、王梦婷：《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一种跨国安全治理的新探索》，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1期，第16页。

37 余潇枫、谢贵平：《选择性再建构：安全化理论的新拓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09期，第121页。

共治，并不是一味地妥协忍让和委曲求全，对于故意、蓄意、恶意与故意侵犯我国家核心利益、威胁我总体国家安全的行爲，我们也需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采取反制和反击措施，才能有效维护我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一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二是全面加强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强制陆权、制海权与制空权一体化建设，提升我国军事反制能力。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及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三是推进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加强我国海外安保力量建设。深入贯彻2022年6月13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创新军事力量

运用方式，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分步推进我国海外安保力量的体系性建设，在全球涉我核心利益区加强海外安保力量的战略布局，在突发紧急状态下，有效维护我国海陆能源和贸易通道及我国海外人员和海外利益安全。四是严厉打击那些攻击、绑架、勒索我国海外人员与破坏我国海外利益并造成重大损失的恐怖组织和极端分子。

结语

“全球化爲人类带来了共享安全文明的便利，也带来了共度危机灾难的可能”³⁸。我国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治理不仅需要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提高安全风险防范能力，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发展，还要助推“平安中国”和“一带一路”建设，维护海外利益。“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是新时期国际关系发展大势所趋”³⁹。因此，我国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治理一方面需要放眼世界的趋势与潮流，基于全球性视野、前瞻性思维和战略性考量，以全人类共同的安全利

益为思考基点，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制制定，优化、整合国际社会的多种力量与要素，协调相涉行为主体之间的冲突并推进相互间的合作。另一方面，需要立足本土的历史与现实，根植于中国和合主义的历史传统与哲学精神，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树立起共商、共建、共赢的理念，建构具有中国视角、中国语境与中国范式的外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探索一种能够包容更多主体、族群、文明并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美国优先的治理理念与模式，基于“和合共生”，达成和合共建，实现和合共享，才能实现全球公共福祉和全球公共利益，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才能有利于为新时代全面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与利益、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提供思想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

编辑：王星懿

38 余潇枫、罗中枢、魏志江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39 刘振民：《坚持合作共赢携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页。

编辑团队



王星懿
执行主编



何香凝
研究助理



伍杰辉
研究助理



王钰静
研究助理



许汶
研究助理



殷晓榕
研究助理



杨佳琦
校对编辑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

本刊由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联合出版，旨在跟踪观察非传统安全议题下的社会资讯、政策动向和学界研究，为从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工作人员与研究人员提供时新、长久的信息渠道。

本出版物内容版权属于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转载、摘编请注明“来自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如因作品内容和版权问题需要同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联系者，请于 30 日内进行。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26 号亚洲国际
大酒店 1803 室

联系电话：
020-83870795